

## Column

■郑国韶乐

一片彩云  
在早春“飘”走后

◎郑韶

上海市政协常委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

阿里巴巴·马云的路径是以贸易带动物流，引发金融需求从而介入借贷业务，而这正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当初上海看到马云模式的广阔产业和市场前景，能把阿里巴巴的核心业务一并请到上海，支持其做大，不就能给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增加了强大的带动力了么？不就可以借市场之力而非政府财力再造一个“百联”了么？

阿里巴巴·马云成了今年春天里的一朵彩云。它从哪里走、飘向何处，不断引起各地高层的关注。笔者的参与源自年初一个“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的高端对话。而此对话的一种解读本人正好有点积累。读者如有兴趣，可回看今年二月一日本专栏之“上海为什么出不了王石、马云”。

令笔者欣慰的是，不仅马云，而且衍生的小文，都引起了不小的、持续的关注。这令我驻足再思考，进而深入再了解。又有所得，谨与读者共享之：

其一，阿里巴巴公司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贸易和中国本土贸易网络交易市场，是2007年中国居上海“百联”之后第二大综合商品卖场；2400万用户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员工4400，另创造岗位带动社会就业过20万人。其所创立的“淘宝网”和“支付宝”用户均已超过4000万。新的业务还涉及管理软件开发，以及引人注目的金融业务——网上联保无抵押低息贷款——在浙江十城市先行试水。

其二，从1998年创业至今，阿里巴巴·马云的运营总部一直在习称“天堂”的杭州。因此，说马云没出在上海是对的，而说上海留不住阿里巴巴·马云，就有失偏差了。

但是，之所以说有偏差而不说毫无依据，是因为去年初做大的了的阿里巴巴的确在上海撒下一片云，建了一个企业管理软件开发的子公司。可能还想借上海之势把这片IT云长足放大呢。但是它最终“飘”走了，今年1月，公司注册地搬回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老家去了。于是，就生出上海难留马云之叹，不出马云之问，以及后来广东赴杭探“云”而浙江紧张护“云”的轶事佳话了。

幸而笔者非地方长官，不必为一省一市GDP或财政收入的起落殚精竭神；而作为研究者则应尊崇规则、规律，也不应对云来云去飘渺惟家多说闲话。但经过近日的深加考究，觉得进一步探析阿里巴巴·马云的社会价值所在，应该是更有意义的话题。据本人的理解，对关注马云的政府（而非市场）来说，有三点特别有教益：

首先，阿里巴巴·马云的成功之路揭示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某些规律，对受命大力推进服务业发展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的政府富有启示意义：一是现代性：必须尽可能地利用IT时代的所有先进技术工具去创造服务模式、内容和策略，去提升传统服务，拓展新的服务需求市场；二是服务性：应当真诚地服务于生产、服务于消费，服务于所有客户显在和潜在的服务需求。“淘宝网”为所有交易主体提供网上交易的便捷、低成本通道，就是一种尊重市场主体的服务文化的真诚表达和认真恪守，它失去的或许是一部分可得应得的短期收益，收获的长期价值是广大客户群、市场网络和社会信用。三是泛化：要千方百计让社会所有个体、群体都能便捷地成为服务的供方、需方或中介方——只要他愿意。马云推“支付宝”、推企业管理软件，正是要让“淘宝网”的几十万中小客户、个体户甚至个人都能成为交易活动的合格主体。由此产生一个政府愿意看到的财富效应：让更多的民众和民营小企业能够通过专业化、简易化的经营活动，增加经营性乃至财产性收入，同时也享受服务优化带来的福利。如果忽

视上述“更多”的特征，沿用习惯的产业模式、工作方式去抓服务业，结果恐怕是竹篮打水，因为服务业的经济规律决定了企业小型化、民营化、大众化趋势，如马云之大的企业，毕竟只能是这个产业凤毛麟角的稀缺物品。

其次，服务业的抓手或切入点（文件惯用语），目前应以贸易为重。此贸易是指大贸易、现代贸易，举凡内外贸、批零商业、电子交易、实体商业、服务贸易等等，所有传统的、现代化的商品交换流通形式均包含其中。所有这些贸易市场加总的大贸易产业，应当是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交通枢纽型大都市的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由此产业的率先发展，必然带动运输业、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关装备及制造业的发展。若没有贸易引起商品的流通进而拉升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的需求等等，反而力推金融、航运优先、超常发展，那请问运输什么？融资何用？现在，阿里巴巴·马云的路途提供了一个正面例证：他抓住了贸易，然后带动了物流，又引发了金融需求从而介入借贷业务，而这正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当初上海看到马云模式的广阔产业和市场前景，能把阿里巴巴的核心业务一并请到上海，支持其做大，不就能给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增加了强大的带动力了么？不就可以借市场之力而非政府财力再造一个“百联”了么？

再次，服务业的抓手或切入点（文件惯用语），目前应以贸易为重。此贸易是指大贸易、现代贸易，举凡内外贸、批零商业、电子交易、实体商业、服务贸易等等，所有传统的、现代化的商品交换流通形式均包含其中。所有这些贸易市场加总的大贸易产业，应当是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交通枢纽型大都市的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由此产业的率先发展，必然带动运输业、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关装备及制造业的发展。若没有贸易引起商品的流通进而拉升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的需求等等，反而力推金融、航运优先、超常发展，那请问运输什么？融资何用？现在，阿里巴巴·马云的路途提供了一个正面例证：他抓住了贸易，然后带动了物流，又引发了金融需求从而介入借贷业务，而这正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当初上海看到马云模式的广阔产业和市场前景，能把阿里巴巴的核心业务一并请到上海，支持其做大，不就能给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增加了强大的带动力了么？不就可以借市场之力而非政府财力再造一个“百联”了么？

再次，服务业的抓手或切入点（文件惯用语），目前应以贸易为重。此贸易是指大贸易、现代贸易，举凡内外贸、批零商业、电子交易、实体商业、服务贸易等等，所有传统的、现代化的商品交换流通形式均包含其中。所有这些贸易市场加总的大贸易产业，应当是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交通枢纽型大都市的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由此产业的率先发展，必然带动运输业、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关装备及制造业的发展。若没有贸易引起商品的流通进而拉升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的需求等等，反而力推金融、航运优先、超常发展，那请问运输什么？融资何用？现在，阿里巴巴·马云的路途提供了一个正面例证：他抓住了贸易，然后带动了物流，又引发了金融需求从而介入借贷业务，而这正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当初上海看到马云模式的广阔产业和市场前景，能把阿里巴巴的核心业务一并请到上海，支持其做大，不就能给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增加了强大的带动力了么？不就可以借市场之力而非政府财力再造一个“百联”了么？

再次，服务业的抓手或切入点（文件惯用语），目前应以贸易为重。此贸易是指大贸易、现代贸易，举凡内外贸、批零商业、电子交易、实体商业、服务贸易等等，所有传统的、现代化的商品交换流通形式均包含其中。所有这些贸易市场加总的大贸易产业，应当是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交通枢纽型大都市的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由此产业的率先发展，必然带动运输业、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关装备及制造业的发展。若没有贸易引起商品的流通进而拉升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的需求等等，反而力推金融、航运优先、超常发展，那请问运输什么？融资何用？现在，阿里巴巴·马云的路途提供了一个正面例证：他抓住了贸易，然后带动了物流，又引发了金融需求从而介入借贷业务，而这正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当初上海看到马云模式的广阔产业和市场前景，能把阿里巴巴的核心业务一并请到上海，支持其做大，不就能给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增加了强大的带动力了么？不就可以借市场之力而非政府财力再造一个“百联”了么？

再次，服务业的抓手或切入点（文件惯用语），目前应以贸易为重。此贸易是指大贸易、现代贸易，举凡内外贸、批零商业、电子交易、实体商业、服务贸易等等，所有传统的、现代化的商品交换流通形式均包含其中。所有这些贸易市场加总的大贸易产业，应当是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交通枢纽型大都市的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由此产业的率先发展，必然带动运输业、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关装备及制造业的发展。若没有贸易引起商品的流通进而拉升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的需求等等，反而力推金融、航运优先、超常发展，那请问运输什么？融资何用？现在，阿里巴巴·马云的路途提供了一个正面例证：他抓住了贸易，然后带动了物流，又引发了金融需求从而介入借贷业务，而这正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当初上海看到马云模式的广阔产业和市场前景，能把阿里巴巴的核心业务一并请到上海，支持其做大，不就能给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增加了强大的带动力了么？不就可以借市场之力而非政府财力再造一个“百联”了么？

再次，服务业的抓手或切入点（文件惯用语），目前应以贸易为重。此贸易是指大贸易、现代贸易，举凡内外贸、批零商业、电子交易、实体商业、服务贸易等等，所有传统的、现代化的商品交换流通形式均包含其中。所有这些贸易市场加总的大贸易产业，应当是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交通枢纽型大都市的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由此产业的率先发展，必然带动运输业、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关装备及制造业的发展。若没有贸易引起商品的流通进而拉升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的需求等等，反而力推金融、航运优先、超常发展，那请问运输什么？融资何用？现在，阿里巴巴·马云的路途提供了一个正面例证：他抓住了贸易，然后带动了物流，又引发了金融需求从而介入借贷业务，而这正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当初上海看到马云模式的广阔产业和市场前景，能把阿里巴巴的核心业务一并请到上海，支持其做大，不就能给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增加了强大的带动力了么？不就可以借市场之力而非政府财力再造一个“百联”了么？



张大伟 制图

## ■内外

细细算算  
入境热钱究竟有多少？

——“我看热钱与资本管制”之二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乱花渐欲迷人眼。目前国内测算热钱流入的方法种类繁多，关于当前中国热钱流入的具体规模也尚未达成共识。要准确测算热钱流入规模，第一要全盘摸清热钱流入中国的渠道，第二要获得准确的跨境资金流动数据，包括准确的贸易和投资数据。很遗憾，目前这两方面的进展均不尽如人意。

测算热钱规模的最简单方法，是看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如果该项为负，说明资本外逃，如果该项为正，说明热钱在流入。误差与遗漏项也等于外汇储备变动额减去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之和。如果用这种方法来测算中国的热钱规模，那么2003年和2004年存在热钱流入，规模分别为184亿美元和270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存在资本外逃，规模分别为168亿美元与129亿美元。这个结果与我们的常识不符，因为在我们印象中，2005年和2006年应该是热钱大规模流入之年。看来用误差与遗漏项来测算热钱规模的方法过于简单。其一，误差与遗漏项可能的确是统计方面的误差造成的，并非热钱流入；其二，热钱完全可以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入中国国境。

业界普遍使用的测算热钱规模的方法，是用外汇储备变动额减去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以这种方法来计算，那么2003年至2007年的热钱流入分别为378亿美元、1141亿美元、466亿美元、6亿美元和1170亿美元。如果这种方法是准确的，那么2006年基本上没有热钱流入。然而，据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的分析，由于存在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外汇掉期、央行允许商业银行用外汇交存准备金等制度创新，以及采用特别国债置换外汇储备的方法创建中投公司等制度安排，用上述方法计算的2006年和2007年的热钱规模被明显低估。

例如，2006年央行与商业银行有大约758亿美元的外汇掉期，因此2006年的热钱流入规模约为764亿美元。考虑到中投公司的成立、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掉期和准备金操作等因素，2007年的热钱流入规模上升到4767亿美元；再考虑到虚假贸易，那么2003年至2007年的热钱流入总规模又上升到88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还没有考虑虚假的FDI流入。如此，综合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测算结果，当前中国国内的热钱总体规模约在5000亿至10000亿美元左右。应当说，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第一季度，热钱有加速流入中国的趋势。本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加1539亿美元，贸易顺差为414亿美元，FDI为274亿美元。粗略估算，今年首季度流入中国的热钱约为851亿美元。这样的热钱流入加剧是与人民币升值加速紧密相关的。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FDI数据。例如，2004年，商务部统计的FDI为606亿美元，外管局统计是549亿美元；2005年，商务部统计

## ■知无不言

## 没有公民社会 市场经济体制行之不远

——兼议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在非自然世界里，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恐怕没有谁会奢望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得完全合理。问题是，当不合理现象长时间发生在人数众多的群体上，并且程度相当突出时，就会超出人们的容忍度，社会迟早会通过特定方式予以纠正。只是，如果其他相对优越的社会群体不想做出应有的让步，更广泛的社群政策也只局限于“小打小闹”，或者只停留在口头的同情表达，老是存有拖延的侥幸心理，而不想顺应历史趋势根本性主动调整社会利益格局，则到头来纠正的被动性及其导致的社会整体代价会更大。

中国近60年的城乡分割，特别是城市对农民的持续排斥，市民身份的自我封闭，形成了一个受到不合理对待的超大群体：只能在城市做工而不能获得市民身份的农民工。他们拿到的薪酬低于自己的边际劳动产出甚至还不一定及时足额拿到。他们为城市作了贡献却得不到应有的公共服务——特别是由公共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有估认为这一群体有1.5亿人。如果算上他们被迫长年分别在乡村老家的配偶、孩子、父母，在哪儿工作就可以在哪儿全家定居的自由选择原则，则这一群体规模不会低于3.75亿人。按一个进城工作的农民工平均带有1.5人计算。

当然，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不合理，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迄今为止，大家看到的政策都不是整体和根本性的而只是一些零敲碎打。甚至，有些政策非但不能缓解问题，反而是在突出并加重问题。比如，春节前后，在中国大中城市的火车站，几乎都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临时标示牌“农民工购票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人都会想信，这是有关部门为方便农民工购票乘车而特意设立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或许也会有一些帮助。但这一措施是传统体制下身份制社会的典型体现，并加重了人们对三六九等特定身份的认定，不仅不是对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身份制社会的消解，反而是一种巩固和深化。它所产生的那一点点并不能确定的方便，其实早就被人为凸现的“弱势身份”感的负面效应所淹没了。

我在此例举这一现象，不仅仅是想说明同情是有限度的，帮助应该是讲求方式的，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的同情都是被同情者所需要的，也不是所表现出的同情心越强烈，就对别人越有帮助，特别是在对一个庞大的社群表示同情心时，就更应该加以注意。我更想借此说明的是，在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增长后，中国还没有跳出“身份制社会”的传统体制束缚，经济、政治、社会结

构的变迁是滞后的，升级更是极其有限的。“农民工”这一称谓就打上了深深的中国传统身份烙印。哪怕你是在10年前就脱离了乡村而在城里从事现代工业生产活动，但只要你没有取得城市居民身份，就还只能是“农民工”。更多情况下，“农民工”者，亦工亦农人士也。城市需要你在城里工作时，你才有机会，但是，只为城市工作，却不允许你占用城市资源，因为城市不提供给你住宅、社会保障，养老还得回到农村老家去。

发达工业化社会的数据显示，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最大社会结构变迁就是城市化，也就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城市化，成为市民。工业化所推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与壮大，所带来的一大最大社会发展成果就是，推动人类历史由“身份制社会”步入了“交换社会”或“公民社会”——普遍的权利平等与自由。相比之下，中国在经历了30年持续高速增长后，已经步入了工业化的快速推进阶段，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程度，但大量农民工的存在毫无疑问地说明，城市化严重滞后，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的过程中，社会转型严重滞后，几乎所有人口及其经济生活在被卷入已经无处不在时不外的市场的交换经济的今天，公共权利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却仍然依据传统身份制框架，身份制仍主导着社会运行，公民社会的建设与目标被排斥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视野之外。

这显然是有违于人类历史经验的，逻辑上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问题是刚刚产生，或者尚不严重，或者还没有足够力量予以解决，也许还不会令人变得更加不安。但是，如果问题已经长时间存在并变得日益严重，已经具备足够力量来解决问题，却迟迟见不到切实有力的决心和措施，那是令人难以容忍与不安的。中国目前的情况，就属于后者。

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应当尽快解决本应早就在城市里安居乐业的3亿多农村人口真正被城市化的历史欠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整体部署，将公共权力在城乡居民中公平分配，无论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还是在社会体制建设上，着力将向体现普遍权力平等的公民社会转型摆上首要的议事日程。

增长与发展是两码事。30年的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相应水平的经济发展，更不意味着应有的社会发展，因为，增长只是一个量的概念，发展则意味着结构改进与优化。只有增长没有发展，不会带来人类文明的进步。只有发展，才是对整个世界的切实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带来应有的发展，但发展的滞后却会中止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当今的中国正处于这一关键时刻。是主动利用3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成果，以推动经济与社会步入发展期？还是一味沉浸于30年经济增长业绩，延缓甚至拒绝进一步改革？现在已到了抉择的时候！

## ■德鲁克在中国

## 创造力和激情最怕“监督”“控制”



◎黄建东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

有这么一家出版社，原来是机关的附属机构，专门出版行业的相关书籍，同时还发行一份行业报纸。机关每年都会提供给出版社一定程度的政策性财政补贴。比起那些需要在市场上打拼的企业化出版社来说，他们简直是太幸运了。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机构精简、政企分开后，这个出版社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他们一下被“断了奶”，不得不去直接面对市场了。为了生存，不被市场淘汰，进而实现比较好的经济效益，管理层在出版物的选择、市场营销、乃至内部管理上，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他们凭着自己对亨利·法约尔于1916年首次提出、现在似乎成了管理学主流的四个词“计划、组织、监督、控制”——一知半解的认识，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整套对员工“监督、控制”的制度：首先要求所有的编辑、记者按时上下班。为此，出版社特地添置了打卡机，员工上下班必须打卡，用以记录每人每天究竟工作多长时间。其次，管理层设计了一系列的表格，请每个员工定期填写。其中包括了绩效评估表。对编辑、记者们的工作态度、工作量、书籍选题、出版所需要时间长短，报纸文章、栏目、版面等项目逐一评估。这种考核的内容甚至还包括对员工的日常行为规范。比如，制度规定了员工上班时必须规范着装：男性穿西服、领带、皮鞋；女性着职业正装；不允许休闲服、休闲鞋等等。按照管理层当初的设想，绩效评估的结果将与年终奖金直接挂钩。

但是，实施这套制度后，不仅出版的书籍和报纸质量没有大的改善，有些不愿意受约束的优秀编辑、记者甚至用脚表态——干脆辞职走人，有的还被邀请到相关的出版社任职。这种结果，实在是报社管理层根本没有预料到的。第一次绩效评估于是就在多数人的失望中悄无声息地“寿终正寝”了。

这样的例子今天在很多知识工作者的企业中经常能够遇到：用管理体力劳动者的方法去管理现代的知识工作者。没有深入了解知识工作者的特点，又怎么谈得上去如

何“引导”知识工作者呢？这种对知识工作者失败的管理，还因为管理者仍然用传统的管理观念和方法去“管理”人，而这些观念和方法正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的管理观念把“控制”作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这里的控制不仅是对工作进程的控制，也包括对人员的控制。当泰勒发现科学管理的时候，为了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需要去监督、控制，这种对体力劳动者的监督、“控制”的假设是：这些人中大多数人要么没什么技能也没有，要么只掌握初级的技能，组织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当这个假设刚提出来时，还符合事实，但是在知识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时候，这种假设再也站不住脚了。

在前提假设错误的情况下，再用“监督”、“控制”的方法去“管理”知识工作者，不出问题倒是奇怪的了。

今年两会期间，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做客中央电视台，当被问到中科院现在是两个面向，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只能面向一个方面，中科院是如何协调时，路院长说了几句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话：我们不干预科学家具体去做什么，选什么，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只有他本人最了解，科学是一个很前沿，很有风险的事，更何况是创新，更要尊重科学家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政府要做的，科学院管理部门要做的，就是创造宏观的环境。

而不少知识工作者成堆的公司，却仍然在使用甚至强化对体力劳动者管理的办法。他们把工作需要与外界联系的网上即时通讯工具从网络上屏蔽掉；不断填写各种繁杂的表格；甚至知识工作者出版著作、发表文章，还要通过那些外行的“管理者”的“审查”……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家出版社所遇到的，恰恰就是这样的问题。

繁杂的规章制度束缚和“监工”式的监督严管，可能会使知识工作者丧失所有的激情和创造力，而激情和创造力是企业启用这类人物的关键。要真正地“管”好知识工作者，就得去认真研究知识工作者的特点，了解他们的工作需求。如果给他们创造一个能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自我控制，则知识工作者本人会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信任，企业的绩效将会随着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提高而大幅提升。